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传统媒介与 典籍文化

于翠玲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传统媒介与 典籍文化

于翠玲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于翠玲著.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5

ISBN 7-81085-718-5

I. 传… II. 于… III. 古籍-研究-中国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4470 号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

作 者: 于翠玲

责任编辑: 李 颖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85-718-5/K·718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序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励耘文库”之一，是新闻传播学研究所、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在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长年研究、实践基础上，倾力推出的一套学术精品丛书。该丛书的理论视野涵盖文化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两大学科领域，广泛吸收了当今西方传播理论、媒介哲学、大众文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编辑出版学、文献学以及当代国学研究的理论，密切贴近当代媒介研究、传媒实践、文化产业发展等实际需要，是国内文化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批领先之作。

传播是自然生态信息与人类生命信息、社会人文信息之间的流动、分享、读解、诠释、传承、播撒的永恒历史进程。当代传播学研究，不仅考察自然生态信息、社会信息与人文价值的流动分享，也考察这一流动、分享过程得以运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机制。人类的知识或信息传播，是一种文明价值或人文意义的传播，是人类知识或信息得以生成、固定、传承、读解、接受、变形等传播机制以及传播技术持久作用的结果，是特殊政治经济利益与价值观的产物。一言以蔽之，人类传播活动的基础与核心，是文明传播或文化传播。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Innis, 1894~1952) 在名著《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1950) 等著作中提出的理论观点、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 (Neil Postman, 1931~2003) 在名著《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2003) 等著作中的分析考察、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等等, 是这套丛书的理论基础。

媒介即世界观。今日能量巨大的大众传播媒介, 透过自己强大的话语方式与传播机制, 持久广泛地作用于受众的感官和头脑, 最终将一种固定模式的、常常未经检验的世界观强加给大众, 进而成为当代全球社会的主宰力量之一。

丛书在批判西方近代主流世界观及其媒介价值观的基础上, 深入挖掘中西世界观在古代和近代形成、确立、传播、成熟的社会历史文化机制, 探讨媒介世界观在古今社会的传播方式、在近代社会与西方世界观的激烈碰撞、相互传播与融合, 探讨了媒介世界观在当代文明传播的均衡、公正、有序、和谐等层面以及媒介在产业制度、商业运作等领域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是国内学术界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传播理论打通、结合的大胆尝试。

2006年5月21日

目录

CONTENTS

总序 /1

绪论：中国典籍研究的多维视野 /1

一、传统媒介 /1

二、典籍文化 /6

三、阅读视野 /9

第一编 传统媒介

第一章 传播史料的价值与整理利用 /12

一、中国传播史料的价值 /12

二、传播史料整理的框架 /15

三、传播史料的检索 /18

四、传播史料的利用 /20

五、伊尼斯有关中国史料的偏差 /23

第二章 古代图书编辑与出版概念 /31

一、古代编辑活动的起源 /31

◇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

二、古代编辑与出版的关系 /36

第三章 古代出版格局与传统文化 /40

一、“士”阶层与编辑出版事业 /40

二、官方“文治”传统与出版工程 /43

三、民间编辑出版物与图书市场 /45

第四章 印刷媒介演变与文化转型 /49

一、出版传播与复制技术 /50

二、编辑出版物与社会文化建构 /52

三、新式传播媒介与社会变革 /54

第五章 “采诗”传统与近代办报观念 /60

一、古代文人的“采诗”说 /60

二、近代报人的“采诗”说 /63

三、传统“采诗”说的突破 /66

四、媒介功能与社会变革 /68

第二编 典籍文化

第六章 官修类书的编辑传统及其终结 /72

一、标榜文治的编辑理念 /72

二、文献一统的编辑体例 /76

三、以类相从的编排方法 /80

四、类书编辑传统的终结 /83

第七章 从博物观念到博物学科 /89

一、中国古代“博物”观念 /89

二、中国古代博物知识的分类体系 /91

- 三、西方“博物学”概念的引进 /93
- 四、西方博物观念与中国博物资料比较 /95
- 五、中国近代新式博物辞书的特点 /99

第八章 类书资料与狐幻文学 /103

- 一、狐的属性与祥瑞说 /103
- 二、狐的形象与诗文 /106
- 三、狐的幻化与小说 /108

第九章 诗歌选本与梅花文化 /113

- 一、“别出梅花一类” /113
- 二、类书体例的影响 /115
- 三、汇集评注资料 /117

第十章 摘句品诗与名句传播 /122

- 一、摘句品诗的由来 /122
- 二、诗选与“秀句” /127
- 三、摘句现象的成因 /130

第三编 阅读视野

第十一章 儒士读书与隐士读书 /136

- 一、儒士的读书方式 /136
- 二、隐士的读书方式 /145
- 三、陶渊明的自我传播 /150

第十二章 读书文化与家族风尚 /160

- 一、读书：士人的技能 /160
- 二、读书法：苦读与“涵泳” /163

◇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

三、藏书：读书种子不绝 /168

第十三章 女性规范与闺塾阅读 /175

一、为“女德”作《女诫》 /175

二、为《诗经》动情肠 /180

三、才女的读书空间 /185

四、新媒介与新女性 /189

第十四章 西书东渐与文化融合 /194

一、利玛窦：“合儒”的传教策略 /194

二、梁启超：融合中西学术 /200

三、当代的“国学”声音 /212

第十五章 大众文化与典籍解读 /218

一、以“正说”矫正“戏说” /218

二、以“大话”拆解名著 /220

三、以“读图”诠释古籍 /222

绪论：中国典籍研究的多维视野

本书以中国典籍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考察中国典籍作为一种传统媒介的特征及其在编辑出版与传播史上的意义；一方面探讨中国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所形成的独特的知识结构体系、阅读方式和传播现象。

一、传统媒介

传统媒介是相对于新媒介而言的。传统媒介，指印刷媒介以及印刷前的传播媒介，也概称为印刷媒介，或者旧媒介。左藤卓己所著《现代传媒史》将图书称为旧媒介。^① 约书亚·梅罗维茨所著《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以书籍作为印刷媒介的典型，以电视作为电子媒介的典型。

一般来说，媒介史研究比较侧重将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相对比。《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概括：“‘印刷社会’实际上是口语—书写—印刷社会；‘电子社会’实际上是

①（日）左藤卓己著，诸葛蔚东译：《现代传媒史》，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口语—书写—印刷—电子社会。这种简写的标签仅仅是强调了引起传播变化的最新的重大进展。”^①或者以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媒介为标志，以新媒介取代旧媒介的趋势，来划分文明的进程，概称为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在印刷传播时代，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因为“印刷时代的到来，是建立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两大贡献”。^②

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人们习惯于把当今时代称为“读图时代”（以电子图像为主）。如果借用这个通俗的说法，那么此前的时代可以称为“读报时代”，再往前就是“读书时代”。本书特别关注的是：中国“读书时代”（古代）的特征以及从“读书时代”到“读报时代”（近代）的演变。这种考察是以“读图时代”作为参照的，相对于以往处于“读书时代”的学者来说，我们今天有了一个长时段的比较和反思的基础。这正如《书籍的历史》的作者所感慨的：“很久以来，我们就已经告别了书籍系统的独占时期，但这一现象才刚刚被更好地理解和研究。”^③

中国古代社会正是一个“书籍系统的独占时期”，而且这一时期长达数千年。中国典籍的载体形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史，从甲骨、金石、竹帛，到纸写本、雕印本，再到机械复制本。每一次载体形式的变化，对于典籍的传播、读者的接受、社会信息的流通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报纸、期刊等新式印刷媒介的出现，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因此，从媒介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典籍作为一种传统媒介的特征，不仅拓展了中国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视野，也是中国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33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②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③（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40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分。

关于传统媒介的研究，西方传播史论著，特别是加拿大学者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学者有关技术媒介对社会结构以及人体自身的影响作用的分析，给予我们许多启发。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指出：麦克卢汉同伊尼斯一样，“把西方近代史解释为‘建基于印刷文字的传播上的偏颇与知识上的垄断的历史’”；“所谓传播上的偏颇，指的是印刷媒介的压倒优势”。^①目前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等书，也偶然提到中国的史料（其中有偏差）。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印刷媒介的压倒优势”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印刷技术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什么不同于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中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数量众多的典籍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值得我们去开掘和探求。

古今的比较，特别是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比较，是媒介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这就需要把所有的媒介放在一起，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不同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也各具特点，研究媒介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也就是要“把各种延伸放在一起同时考虑”。^②尼尔·波兹曼也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媒介（印刷书籍和电视），具体分析了其如何塑造了不同的“儿童”（包括“成人”）概念。^③

今天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电子媒介，为我们回过头去看各种媒介，提供了比较的可能和现实的意义。麦克卢汉指出：“今天，电传信息的瞬间速度，破天荒第一次容许我们看清变迁和发展的模

①（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②（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50页，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③（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荃译：《童年的消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式和规模。大千世界——过去和今天都是这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犹如一部高速电影中一株猛长的植物……倘若我们倒着播放文字、印刷术机器对社会经验和组织的影响那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容易看到……倒着播放时，我们在熟悉中发现了陌生，并因此而受到震撼。”^①《认识媒介文化》一书如此阐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时间和空间的彼此协调已经消失，迎来了这样一个世界：书本文化所培植的个体化独立感，被人人都‘深刻地牵扯到每一个他人’的感觉所取代。诸种新媒介的迅猛发展，破坏了文字传播形式对视觉的偏倚，使全球公民都回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这种共同的文化与口语社会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全球村已将等级、统一和个体化的印刷制作文化横扫于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可触知的同步文化。”^②

回过头去看，这也成为媒介史的基本框架。《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指出：“通过回头去看并且仔细地考察传播媒介和文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进化路程，我们就能够找到为我们洞察未来提供可贵的模式和原则。这就是《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这本书的基本前提。”^③《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一书前言指出：“我纳闷，在无线电和电视、电影、留声机以及令人瞠目的多样化的定期报刊出现之前，生活本来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广义上说，我最初关注的事情，是探索传播媒介如何改变了上一个半世纪美国的环境。新的传播媒介是如何影响了传统的空间和时间观念、闲暇和消费的实质、社会化的进程，以及思想风气？它们实际上为何对美国日常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本书是想用某种方法弄清今天的传播媒介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想再现这些媒介所微妙地否

①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4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② (英) 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1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③ (美) 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中文版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定了的过去，想还原它们的公开面目，想把我们用以测量和解释过去事物的文化含义的那种方法置于一定的历史地位，本书就是这些思想冲动的最终成果。”^① 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也谈到：“关于印刷媒介史的研究已经彻底摆脱了行业中的研究模式，由于各种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源源源不断地汇入，它已经日益整合为一个有其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方法的研究领域，而且正是其在多学科的边沿性而更显价值不菲”。研究当今的“信息社会……无可回避的基础便是对信息传播的历史考察。因此，关于印刷媒介历史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②

本书试图借鉴西方媒介史研究的视角，以中国典籍为基本资料，回过头去观察中国传统媒介对士人的阅读生活、思维方式有什么影响，以及传统媒介的演变对中国社会的进化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在中国近代出现的意义，以及电子媒介在当代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其中包括中国典籍资源在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变异现象（成为颠覆的对象）。《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指出：“新媒介之所以会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与旧媒介不同，它改变了依赖于早期传播手段的那些社会方面……相同的媒介可能对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影响，电子媒介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其结果与电子媒介对我们国家（美国）的影响大不相同是毫无疑问。”^③ 电子媒介对中国的影响如何？起码我们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媒介的历史，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对比和思考的一个方面。

①（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曹静生、黄艾不译：《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② 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1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③（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6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二、典籍文化

任何一种媒介都会制约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特定的知识结构。中国典籍是古代文化的书面载体，通过各种复制技术和阐释方式，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积淀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近代钱振东《书厄述要》指出：“文化之于国家，犹精神之于形骸。典籍者，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① 钱穆 1939 年所著《国史大纲》“引论”开篇就强调：“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② 这其实也是中国典籍所起到的作用：没有典籍，也就没有无间断的、详密的历史记录，也就称不上是悠久的历史了。

关于中国典籍的研究，中国传统小学（文字、训诂、音韵），中国近代用来概括传统学问的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国学”，以及从历史角度研究的，如中国书籍史（图书事业史、藏书史）、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国印刷技术史、中国文化传播史等学科，都与中国典籍文化相关，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和研究成果。这些学科的论著也从各自角度谈到中国典籍的特点，郑鹤声、郑鹤春 1930 年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据说是中国现代第一次使用“文献学”的名称来概括一门学问的，此书已经具有了中外比较的视野：“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也……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京，此为中国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欧西上古文化之起源，殆莫可诘究，不得已姑取发掘之残碑断瓦以为证，而我国人效之，以为非是不足以言史，此大误焉。世界各国，印度自来不重记载，埃及亦稀极古之史，巴比伦诸国，其史大半出于掘藏之推证，而我国史学发生之早，典籍之博，学者

① 王余光主编：《藏书四记》，398 页，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

② 钱穆：《国史大纲》，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之注重，实可谓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欲言远古文化，可由载籍以求之，而非仅由断片古物之推证而后可知也。职是之故，欧西文化为零碎的，而中国文化为整个的，固灼然无疑矣。”^① 钱存训从印刷技术史的角度论述：“在世界文明史中，中国文字记录的多产、连续和普遍性最为突出。中国典籍数量的庞大、时间的久远、传播的广泛和记录的详细，在 15 世纪结束以前，都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②

中国传统学术可以说是以中国典籍为中心而形成的，或者说是书籍分部的学问。中国传统目录书籍具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意义，其中规定了经部（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以此为框架来梳理各部书籍之间的关系；记载了中国典籍的聚散整合、历代整理和流传的情况；也反映了中国典籍的知识体系及其衍生机制。在近代西学书籍和分科方法传入之后，中国传统书目受到了很大冲击。左玉河所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③ 对此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本书仅以梁启超本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和他所开列的西学书目、国学书目，作为一个具体例证。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古代另一套知识分类体系，即作为综合性资料汇编的类书的分类体系，特别以历代官修的综合性类书为代表。本书侧重探讨官修类书的编辑传统、知识结构体系及其在近代所发生的演变。近代以来所谓中学（国学）与西学的论争不断，这也反映了以书籍为基础的两种知识结构体系的区别以及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关于读经问题的反复论争，在当代又有了新的回响。而反思历史，或者重温梁启超一代人对中学、西学的思考及其所达到的深度，这对于认识当

①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7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② 钱存训：《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156 页，载《文献》，1991（2）。

③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代中国典籍文化的传播现象，无疑是一面不可缺少的镜子。

近年来有关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也特别提到中国典籍的特点和研究价值。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迷》指出：“文化与传播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文化离不开传播，而传播本身就蕴含了文化的传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次民族文化的兴衰存亡，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同它的文化传播及文化积累方式分不开。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过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是和中国文化特有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的。”其第三章为“中国的传播方式及特点”，谈到“中国的图书典籍和文献资料如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传播学上值得一提的现象。”^①孙旭培《华夏传播论》第二章也指出：“中国古代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书面化，对书面形式的利用超过任何一个国家。”^②周庆山《文献传播学》也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文献“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媒介”，“实质上是人类文化的、精神的符号交流系统，是人类凭借组织编码的有序语义信息的文本，传播人类信息的重要传播媒介”，“文献系统承担着传播知识及文化的重要使命，既要在空间领域实现共时性传播，又要在时间范畴实现历时性遗传”。^③我们还有必要具体探讨中国以四部分类的典籍在历代流传和阐释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特色。例如，儒家经典注疏系列“述而不作”的传统、史部书籍“微言大义”的话语方式、道家书籍的“谈玄”方式、类书对各种典籍资源的整合方式等等。而如何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搜集和整理有关传播思想、传播行为等方面的史料，为传播学研究提供本土资源，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

① 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迷》，8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②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③ 周庆山：《文献传播学》，3页，4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